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驳斥 日本右翼座谈会的发言

编者按: 针对日本右翼团体 1 月 23 日在大阪集会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集部分研究人员举行座谈, 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和日本右翼否认历史真相反映出的日本社会右倾化问题进行了研讨。这里选录了张海鹏、张振、庄建平、齐福霖、王建朗研究员及本刊副主编荣维木的发言。发言标题均由发言者根据发言内容自行拟定。

警惕日本的动向

张海鹏: 最近日本大阪府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右翼集会, 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严正关注, 也引起了国际间特别是东亚地区各国的广泛关注, 正义的、有良心的日本人士也表示了愤慨。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业经发生的历史事实, 有数不清的人证(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和物证, 有大量的文献和图片资料, 有当时居留南京的国际人士的大量证词, 有东京军事法庭的审判纪录和判词, 在当时和现在为中日两国人民、为国际间舆论广泛知晓。从学术角度说, 中国学者经过广泛收集资料、慎密研究, 认为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一段时间里, 日军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居民超过 30 万人, 日本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不到 30 万人, 但是对于屠杀一事, 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人士, 无人否认其为事实。事实俱在, 无论承认与否, 都不能改变其本质。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 我们与日本右翼势力关于南京大屠杀、关于日本侵华事实存在与否的争论, 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而是一个政

治问题。日本学者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还少吗？为什么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而不是以前，连续、频繁出现修改教科书事件（把“侵略”该为“进入”）、内阁要员甚至首相或集体或分别参拜供奉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内阁要员多次否认战争罪行的事件呢？难道他们连小学生的知识都没有吗？这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们还注意到，这种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和行动，有从中央政府向下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趋势。近年来，日本中央政府要员考虑到国际关系，言论稍有收敛（是否如此，还有待观察），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却开始猖獗起来了。首先是东京都，石原慎太郎刚当选知事，就发表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现在大阪府、大阪市又批准右翼势力在堂而皇之的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集会。日本一都两府中的东京都和大阪府如此动向，这对其他地方政府的影响非常值得警惕。必须指出，右翼势力的所谓“大东亚圣战论”、“自由主义史观论”正在日本社会基层发酵，正在争夺和影响战后出生的一代一代青年。1996 年 10 月我在日本神户访问，路过一个不大的须 车站，站台上还有人举着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招募人才的大旗。这说明右翼势力活动何等深入。在日本特有的政治气氛下，年轻一代不愿对前辈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也是右翼势力发酵的一种表征。

联系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东亚局势，日本社会的右倾倾向非常值得学者关注。从这个角度说，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

他们才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

张振：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的集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极大的愤慨。他们的活动表面上是否认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要美化日本那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右翼势力侮华仇华的新表演，对中华民族的新挑衅。12亿中国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近代日本侵略中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持续了70多年。这期间，从日本的国家行为上看，它在对华关系上的历次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为了侵夺中国，它在中国以及在国际上涉及中国的各种重大活动基本上也都是为了侵夺中国。一部近代日本对华关系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日本侵华史。而日本侵华的最大特点就是武力侵略。1871年两国签订第一个条约《修好条规》后，日本对中国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兵侵犯我国领土台湾。接着又发动大规模入侵我东北和山东的甲午战争。此后对华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猖獗，直到制造七七事变，引发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就是这场战争初期日军的一大罪行。我们写过一本《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系统地记述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主要事实，其中包括日本全面侵华和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日本右翼分子或不论什么人谁也抹不掉、洗不净、改不了的。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贼喊捉贼”，说的是有一种人在行窃时高喊捉拿窃贼以转移视线、掩护自己。日本大阪集会的那些人就是在玩弄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他们高叫“彻底检证”所谓“20世纪最大的谎言”以掩饰自己的说谎行径，这些人才真正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他们没有理智，没有理性，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甚至也没有人性。他们的这类活动实际上反映了日本有一批人、有一股力量不甘心那场侵华战争的失败，不甘心日本侵略势力被彻底赶出中国。他们想重温当年在中国作威作福的美梦。他们未必不想再制

造一场侵华战争,再搞一次南京大屠杀或什么大屠杀。对于这些人的这类活动,每一个中国人在愤慨之余,都需要冷静地思考和分析,从中得出适当的教训。

多年来,一说到中日关系,许多人总是讲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这是一句好话。如今从日本大阪集会中应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人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区分为两种:一种人是与中国讲友好并愿意与中国世代友好下去的;还有一种人则不是,他们总在找碴儿制造事端,掀动敌视中国的浪潮,这种人现在就站在中日友好的对立面,还能谈什么世代友好?前一种日本人很多,后一种日本人也并不太少——只要联想一下近年来时不时有右翼政界代表人物跳出来就否认日本对外侵略大放厥词,即使由此丢掉乌纱帽也不思悔改,就可知这股势力的顽固和猖狂,而在大阪集会前两天日本最高法院判定东史郎败诉则表明这个势力在得到日本司法当局的保护和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应引起全体中华民族上上下下的警惕。继续注视日本右翼势力侮华、仇华的动向,进一步提高对他们的侵华活动的警惕性,就是从他们的大阪集会中受到了一次新的反面教育。

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为正义和公理而斗争

庄建平:63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对于这场惊世骇人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不仅中国人民记得,而且亚洲和世界人民也记得。但是,在日本当权者中许多人,以及抱着日本法西斯亡灵的右翼团体和分子,既不服输,又不认罪,屡屡制造事端,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掩盖历史的真相。2000年1月23日在日本大阪,日本右翼分子在地方政府的怂恿下,公然举行集会,

叫嚣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放肆地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罪责翻案。日本右翼势力导演的这场丑剧,把说谎者而且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制造者的本来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面前。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活动,立即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上演的这场丑剧,其伎俩和手段是非常清楚的:首先企图用谎言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继而达到全盘否认日本侵华军队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复活日本法西斯扬幡招魂。有鉴于此,我们与日本右翼势力之间的斗争,绝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彻底批判日本右翼势力反华逆流的一场政治斗争。

回顾过去的历史,诸多事实告诉我们,这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对日本右翼势力反华活动,要做好持久的斗争准备。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日本当时的当权者和现今的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侵华罪责,尤以近20年来,翻案活动愈闹愈烈。大家熟知的重大事件,即日本教科书问题,当权者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电影《自尊》的问题,当权者肆无忌惮的翻案言论,直至这次在大阪的反华集会,这桩桩件件,都表明日本朝野内外已纠合成一股为日本法西斯张目、为侵略历史翻案的逆流。而这股反华逆流,原本潜伏在暗处,现在已跃向前台。我们需要十分警惕,如果这股势力在日本得到猖獗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将会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

我们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活动进行斗争,这是为正义而斗争,为公理而斗争。中国的学界为此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有众多的学术机构和大学院校,民间团体及个人,长期以来,都在搜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例如战争损失问题调查、战争遗留问题的调查(包括日本进行毒气战、细毒战问题,还有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等等)。这些调查日本罪行的工作,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据我所知,

还有一些地方志工作者、退休教员、青年学子们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们对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劳工集中营、重庆大轰炸、细菌战进行了调查。我认为，为了对日本右翼势力斗争的需要，以上调查战争遗留问题，必须由政府进行统一计划，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拨出专项资金，将此项工作有组织的进行到底。

今日之中国人民已经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再也不是50多年前任人宰割的俎肉。我们希冀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代的友好下去。但是这种友好的最为关键的条件，即是必须承认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一切侵华罪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言谈友好。如果日本的当权者以及受其怂恿的右翼势力不认罪，还要为复活日本法西斯扬幡招魂，必将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何来友好基础，还能谈论什么友好下去呢？今日的中国人民维护的是中华民族的尊严，除此以外的一切，中国人民都可以在所不惜。

尊重历史的民族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民族，这已为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所证实。如果象日本当权者和右翼势力，竭力掩盖侵华历史，不能正视历史、并切实地汲取教训，肃清遗毒，那么必将贻祸后代，而一个不愿意尊重历史的民族，是决不能得到其他民族的信任和尊重的，最终倒霉的也必将是他们自己。

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蠢动

齐福霖：1月23日，日本右翼团体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的“彻底验证20世纪最大谎言——南京大屠杀的集会”，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右翼分子召开会议的前一天，日本最高法院无视历史事实判决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东史郎败诉，以及近年来日本阁僚屡次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吗？

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是从战后的50年代开始的。林房雄的《东亚战争肯定论》就提出当时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全面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接着,就是利用教科书否认对中国的侵略。仅从近十几年,我从所了解与接触到的日本右翼势力中,体会到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经历了回避、抵赖、反咬一口的三部曲。

第一步,回避南京大屠杀事件。1987年7月,中日两国历史学家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在日本东京、京都举行了“卢沟桥事变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日本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士,也纷纷在各地举行关于中日战争历史的报告会、座谈会、新闻发布会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日本右翼势力却出来干扰,在会上与会外散播否认侵略的言论。这时原日军士兵东史郎在京都发表并出版了战争日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残暴的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在正义的呼声面前,装聋做哑,没有作出回答。

第二步,抵赖南京大屠杀事件。1997年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了促进中日友好,邀请日本右翼团体人士来北京座谈中日关系历史。在中日座谈会上,日本右翼人士大谈,日本是农耕民族,民族性很温和,又说什么当时南京人口只有二三十万,不可能屠杀30万人,等等,极力回避日军侵华暴行,不承认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虽然这样,日本右翼势力也还没有公开在会上否认南京大屠杀。

第三步,今年1月,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集会,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大张旗鼓地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次是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翻案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从近十几年,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不断升级,可以看到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猖狂,也表明了日本社会

的右倾化趋势正在日益加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否认日军暴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抗议。

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世界上了解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的人还不多。1995 年 12 月,笔者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由北美 20 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1937 年至 1945 年中日战争之再检讨”国际学术研讨会,向研讨会介绍了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的《南京大屠杀图证》,引起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当时参加会议采访的香港明报记者丁果先生,听了笔者介绍与看了《图证》之后,对笔者说北美的许多人对日军暴行,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知道的很少,要求在报纸上刊登大屠杀的图片,笔者予以赞同与配合。于是,香港《明报》(美加版)于 1995 年 12 月 19 日,对《图证》一书作了专题报道,并用半版的篇幅选刊该书的 8 幅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图片,称“这些图片是日人侵华暴行的铁证”。这些图片在《明报》刊出后,在北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使北美民众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从这件事我体会到,必须让世界上愈来愈多的人们了解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真相,才能孤立和打击日本右翼势力。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说: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是当代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使命。我想这也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使命,我们要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行斗争到底。

真正的讨论需要起码的良知

王建朗:最近在日本发生的一些不正常事件,使我想起了两年前的一次经历,想起一位年长者的预言。

1997 年 11 月,在东京参加了第四次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

讨会后,我陪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白介夫先生去关西地区一行,拜访了一些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老朋友。林伯耀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一次谈话中,林先生谈到了东史郎诉讼案中的所谓手榴弹问题。控方指责东史郎日记记载失实,声称日本士兵不可能冒着自身被炸的危险,将绑在邮袋上的手榴弹拉开引信后再将邮袋抬起扔进水塘中。尽管东史郎辩护方指出,旧式手榴弹拉开引信后的起爆时间比较长,完成这一动作并没有任何风险,但未为日本法院所接受。林先生希望中国有关军械检测的权威部门能够对旧式手榴弹的起爆时间进行测定并作出公证,以作为上诉时的证据。介夫先生当即表示,他可以将此事转告国内有关方面,相信有关机构会作出公正而客观的检测。但他同时表示,即使检测结果证明东史郎的记载正确,日本法院能否接受这一结论,是很令人怀疑的。

两年过去了,事情的结果恰恰不幸为介夫先生所言中。尽管中国有关机构作出了检测公证,但日本法院拒不接受这一证据,继续维持东史郎败诉的原判。日本的一些人拒不承认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这只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例而已。

今天在座的都是对中日关系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很多事例来证明日本右翼的荒谬。但我以为,有关日本在华暴行问题已远远不是学术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学术讨论而解决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有关的论据都已清清楚楚地提出,结论也是一目了然。只要具有起码的客观性和良知,都会从目前已经提出的证据中得出不二结论。要进行争论,可以对论据的真伪虚实进行讨论,但不可以对任何证据视而不见。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日本的一些人根本不想进行这样的讨论,对于一切证据都予以否定。这就无法进行任何象样的学术讨论。

我并未对日军在华暴行作过专门研究,仅以我浅显的知识而

言,我也知道有关的四个方面都已就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大量的令人信服的资料。首先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方面,已经出版了大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专著。今天的会议桌上便放着高高的一堆有关日本在华暴行的资料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这一方面我毋须多言。

作为受害者一方的证言,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是,日本右翼极力指责中方有夸大之词,我们不妨退一步而论,暂且搁下中方的证据,观察一下当时作为第三者的西方国家对此有何记载。这些年来,陆续发掘出来的美国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为数不少。除了文字记载外,还有一些极其难得的录像片。作为中立的观察家,日本的一些人有何理由拒绝他们的证据呢?

再退一步而论,如果硬要说来自英美的观察者对日本侵华有所不满,其证言仍不足采信的话,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不久即将成为日本盟国的德国的有关人士的观察,他们是没有任何理由编造和夸大日本的暴行的。这一方面最具权威性的当是《拉贝日记》。《拉贝日记》对日军暴行做了大量的揭露。作为德国纳粹在南京的负责人,拉贝记载的客观性是无庸置疑的。

如果还要强词夺理,否认一切第三者的观察,那么,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作为加害者一方日本军人自己的证言。这一方面,日本也出版了不少旧军人的回忆。《东史郎日记》只是其中的一部。许多日本旧军人的《阵中日记》都记载了当时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其中军阶较高的,有当时任第十六师团长的中岛今朝吾的回忆。中岛的日记中就有将俘获的15000名中国军人分批处理掉的记载。作为日军的高级将领,中岛这样的记叙总不至于无中生有吧。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去起诉这位师团长记载不实。

总而言之,无论是受害者方面,中立者方面(既包括亲华也包括亲日国家的观察者),还是加害者方面,有关日本在华暴行的记

载是大量的,确凿无疑的。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故意地怀有偏见,还能得出其他的什么结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与日本的一些人谈日军在华暴行问题,便完全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是无法在学术层面上加以解决的。

说它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并不是说在日本右翼的不断的挑衅面前,中国学者们便无事可做。正如以上的几位先生所说,许多有关暴行的资料搜集和统计工作还可以做得更细些,更权威,更无可辩驳。深入地挖掘一切可能的历史资料,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学术层面的工作之外,我想,我们不妨呼吁有关方面采取其他的一些相关措施。如上诉国际法院,争取国际反法西斯舆论的支持。可以预见,日本的司法机关在短期内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但在国际舆论界,日本对华侵略和法西斯沉渣的泛起是不得人心的。上诉国际法院的行动必将对日本形成一定的国际压力。在引起国际舆论对此事的了解和关注方面,我们有许多事情可做。

再比如说,日本现在正急切地要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核心成员,它对世界安全将负有重大的责任。而日本作为一个曾对世界的安全产生过巨大威胁,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国家,如果不对自己的这一段历史作出必要的反省,它有什么资格进入安理会呢?它又怎么能让人们安心呢?中国方面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日本和世界表明这一立场。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史观 存在并继续产生影响的原因

荣维木:1月23日大阪右翼集会,在日本掀起了以军国主义史观为指导的歪曲历史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又一波恶浪。为什么

在战后半个多世纪后,军国主义史观在日本不仅存在着,而且还继续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纵观日本战后的历史,我认为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第一,日本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国主义的日本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都受到了正义力量的审判。但是,在战争责任清算方面,德日两国却有着悬殊差别。在德国,不仅在纽伦堡审判中判处了几乎全部战争罪犯,且对战犯的追捕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战争受害国和民间受害者,德国政府实行了彻底的赔偿政策;对于纳粹组织,也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因此,战后至今,虽然德国右翼分子仍然存在,但它的力量远远不能达到可以左右国家政治的程度。日本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由于战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建立,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和“反共”的考虑,认为日本是亚洲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国家,因此,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没有进行彻底清算。东京审判时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除少数战犯得到惩治外,石井四郎等许多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却免于追究。至50年代初,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全部日本战犯陆续获释,其中一些人还担任了政府要职,甲级战犯岸信介一度出任日本首相。而这些人对于日本国家决策,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美国不顾苏联等国和日本国内进步力量的反对,在审判中免除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独有的社会特征,是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及与此相关的天皇专制主义政体。联系到长崎市长本岛等曾因批评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而被右翼分子枪击的事实,可以看出,“皇国史观”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延续至今,与美国放弃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军国主义史观在日本仍然有广泛的社会土壤。日本是

一个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因此与近代其他列强相比,更需要向外寻找原料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而军国主义史观的形成,与日本的这种生存条件不无关系。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尽管国际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日本的生存条件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和平、发展是世界善良人民对人类未来前景的美好愿望,那么基于同样的愿望,日本完全可以在与亚洲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弥补它自身生存条件方面的缺陷。但是,这种客观存在着的生存条件,也使军国主义史观容易在日本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观察,日本政府提出的关于亚洲防务责任和“周边事态”的概念,与当年的保卫“利益线”、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包含了突破岛国局限向外扩张的相同实质。另外从主观方面分析,日本战后的教育使日本国民对近代历史的知识缺乏正确的了解。相当多的日本人只了解到日本在战争中死亡310万人的事实(引自藤原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却不了解由于日本的侵略而造成的数千万中国和亚洲人民牺牲的事实。这样,关于战争“加害者”与战争“受害者”之间的界线就被模糊了。因此,右翼的那种极力逃避战争责任的观点,也就很容易在这些人当中产生影响。另外还应当指出的是,在文化心理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战后的日本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这又导致了不仅日本政府采取了充当美国战略伙伴的政策,在日本社会也广泛地存在着崇美心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不仅日本右翼和政府要员屡屡施放伤害中国与其他亚洲邻国民族感情的言论,而且在民间交往中的民族歧视现象也屡有发生。

军国主义史观的存在及其对日本社会继续产生的影响,不能不使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感到忧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军国主义史观产生的影响在日本取得支配地位,将会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造成巨大威胁。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